

学术专论

# 顺治朝六科制度述略

马子木

〔摘要〕六科为明清两代所特有的监察谏议制度，对廓清政治贡献良多。但历朝《大清会典》对于顺治朝六科制度语焉不详，本文将依托官私记载尝试考察这一时期六科的制度建构以及科臣的选任方式，同时探讨在明清易代之际六科制度的变迁。

〔关键词〕清初政治 六科制度 顺治朝 科道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3-0087-10

明清两代之监察谏议权主要归于六科与都察院。就政制演变来看，两者分别代表谏官与言官的传统，经过宋代以降台谏合一的整合，两者实际共享言谏话语权，因而科道官成为政治运作中颇为活跃的群体。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对于清代科道关注甚少，特别是其制度方面更鲜有涉及，故仍有较大的探讨余地。本文专论六科，因其职司封驳，较监察御史责任尤重，在清代政制结构中亦较为特殊；而将时段限制在顺治朝<sup>①</sup>，一则因政书中对此段记载语焉不详，二则因其正值明清易代后的制度调适期，亦可将六科制度的演变作为理解明清之际制度变迁的个案。

## 一、六科建制

清入关前，并无六科机构，但辽东汉官屡有倡设六科之议。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正蓝旗梅勒额真马光远以政事“或推或诿，率多羈误”，因请“止选老成练达六人立为六科，每科专理一部，注定前件文簿”<sup>②</sup>。其所议之六科体系较为简易松散，是对明代六科参酌女真国俗后减损的结果。同时宁完我亦有设六科之议，皆未见许，因此时政事简易，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文书处理流程，故亦无专设六科之必要。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即清入北京之次日，宣谕各衙门官员开报职名，照旧录用；初六日，复谕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照原官与满官一体办事，清之有六科，自此而始。可以说，顺治初年六科的形成完全是对明代六科之承袭。康熙《大清会典》述六科建制云：

顺治初，置六科满汉官员，裁设不一。十八年，设满汉都给事中各一员，满汉左右给事

〔收稿日期〕2012-11-06

〔作者简介〕马子木（1992—），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本科生；北京100872；mazimu92@163.com

① 在本文中指世祖实际在位时期，但因清在入北京前并无六科机构，故断限为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② 罗振玉辑：《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马光远请设六科奏》，《史料丛刊初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上册，第188、189页。

中各一员，汉给事中二员。<sup>①</sup>

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大清会典》皆因袭此文。核《清圣祖实录》，知顺治十八年改制在二月廿三日，已在圣祖嗣位后。<sup>②</sup> 关于顺治朝六科制度的具体结构，清代政书中语焉不详。本节将给事中、副理事官、笔帖式及主事等方面，依托现存档案史料，尝试还原顺治朝六科的内部结构。

（一）给事中

给事中，袭自明制，分为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与散给事中（以下省称给事中）。据顺治十二年十月吏部奏，“六科原设都给事中六员、左右给事中十二员、给事中十二员，共三十员”<sup>③</sup>。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皆六科均分，例推散给事中亦如是，每科当各二员。按万历时定制，都给事中每科一员、左右给事中每科各一员，散给事中则各科不一，原为 40 员，万历八年减损为 25 员，十一年改为 32 员。清初制度大抵与之相同，惟散给事中之员额较明为少。顺治十五年七月，复裁每科散给事中各一员，亦即给事中总数由 30 员降至 24 员。<sup>④</sup> 事实上，相关规定在制度运作中并未得以悉数遵行。兹根据《清世祖实录》内所载给事中任免状况，将其员额变化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顺治朝历年给事中人数（取当年最高值）

年代	人数	年代	人数	年代	人数	年代	人数
元	20	二	23	三	29	四	31
五	30	六	30	七	29	八	32
九	33	十	32	十一	35	十二	37
十三	35	十四	36	十五	33	十六	33
十七	31	十八	28				

六科给事中人数之升降，目前尚无法完全找到制度性因素加以解答，事实上正足说明清初职官体系的制度化仍不完全，特别是对于品秩较低之官署。至于顺治八年以降给事中人数超额，可以从行政策略的角度考量。顺治帝亲政后，屡次传谕勉言官进言，强调言官“耳目”之作用，如八年三月谕巡按“各宜洗心涤虑，振作精神”；九年十二月李应试案发，谕六科、十四道“各宜省惕，以尽职守”；十一年二月以任珍案谕科道“务要实心为国，直言不讳”。<sup>⑤</sup> 十二年、十七年又递有求言之诏。顺治帝无疑欲以行政资源扩展言路，在此背景下，科道系统受到重视，科臣数额理宜有所溢额。

前引康熙《大清会典》云“设六科满汉官员”，就现存史料而言，顺治朝给事中并无实行严格满汉复职制之确证。事实上，顺治朝给事中 128 名中仅姚启盛为汉军旗人，其余皆为汉官。且姚氏在任尚不足六月。而今可见最早的满缺给事中当在十八年五月，已在康熙帝即位、六科改制后。<sup>⑥</sup> 因此，基本可认为彼时六科给事中为汉官专任之职，而同时御史亦极少有满人担任。<sup>⑦</sup> 但

① 康熙《大清会典》卷 160，《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第 730 册，第 7705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顺治十八年二月癸卯。

③ 《清世祖实录》卷 94，顺治十二年十月甲子。

④ 《清世祖实录》卷 119，顺治十五年七月辛亥。

⑤ 《清世祖实录》卷 55，顺治八年三月癸巳；《清世祖实录》卷 70，顺治九年十二月癸亥；《清世祖实录》卷 81，顺治十一年二月壬寅。

⑥ 内阁大库档案 085717 号，麻喇题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A37—47，麻喇题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

⑦ 苏树蕃：《国朝满洲蒙古御史题名》（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51 册，第 389 页。

并不意味着言谏的话语权尽归汉官，如下文所述，在六科制度设计中新设副理事官及笔帖式等旗缺，而在制度运作中，则严格限制汉官言事之畛域。由汉官独任到满汉复职，事实上是满洲政治渐趋成熟之表现，清入关前监察制度尚未完善，中原王朝的谏议之权在满洲政治中无从体现，因此，于入关之初仍以汉官承继谏议传统，满官则以副理事官处于“监临”之位置，直至十八年六科改制彻底落实满汉复职制，说明满官行政能力之成熟。此过程与清初督抚之任用颇为相似，不过一用汉人，一用汉军而已。

## （二）副理事官

与给事中并列之旗缺则为副理事官。满文写作 *aisilakū hafan*，译写爱惜喇库哈方或爱惜喇库哈番，分满洲缺、汉军缺，《大清会典》仅记有后者，不确。满洲缺始设于何年无考，最早见于顺治八年三月<sup>①</sup>，最晚在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sup>②</sup>，正在六科改制前后。进入康熙朝后，六科副理事官皆不复见于档案或实录中，有理由推测，此官在改制后被裁撤，而归入新设之满缺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在人事上亦有证据，如曾任吏科副理事官的花上，在康熙元年已任吏科都给事中，疑即是裁缺后所补。<sup>③</sup> 汉军缺设于顺治十年六月，因行取者甚多，御史员缺不敷补用，故特设此缺，每科二员。<sup>④</sup> 七月，以知县彭长庚等十二人补任。汉军缺之设本出权宜之策，顺治帝亦知其为冗官，至十三年十月，为缩减朝廷用度，遂谕裁撤，现任者俱改授御史。<sup>⑤</sup> 是后复为满洲旗人专任。

历朝政书对副理事官之地位及作用皆未作明确说明，在此有必要稍加考察。崇德三年（1638），六部各设副理事官，各部员额不尽相同，入关后改称员外郎，初制四品，顺治十六年（1659）改为五品。内院、宗人府、八旗乃至督抚衙门亦曾设有副理事官。六科副理事官之品秩，因史无明文，仅能据有关材料稍加推测，即满洲缺副理事官品秩当高于（或至少等于）都给事中之正七品，汉军缺则与都给事中相同。就升转序列来看，顺治十五年三月，兵科副理事官折库讷迁兵部理事官；顺康之际，吏科副理事官花上迁本科都给事中。<sup>⑥</sup> 六部副理事官、六科满洲都给事中均为正四品<sup>⑦</sup>，若满缺副理事官与都给事中同为正七品，则未免越次迁擢，不合制度。此在档案中亦可获得证明，如八年四月吏科揭参赴任违限官员，吏科爱惜喇库哈方花上列名在都给事中杜立德前。十年十月户科注销本章之题本，其列名为：“户科爱惜喇库哈方臣打哈他、臣夸哈里、都给事中臣杨璜、他赤哈哈方臣乌木恺、右给事中臣陈协。”十三年正月，吏科揭报计册违例题本，爱惜喇库哈方福哈名在都给事中朱徽前。<sup>⑧</sup> 档案中未见汉军缺副理事官与给事中等连衔题本，但就升转论，汉军缺副理事官尽由行取知县、推官补授，裁缺后皆改授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秩仅正七品，适足说明其秩本如此。

由此言之，满缺副理事官虽在《大清会典》中仅留下片语记载，但实为满汉复职制之下六科的满洲长官。但满洲副理事官的建言状况远不及汉官诸给事中，甚至不及汉军副理事官。内阁大库档案中所存满洲副理事官题本，大抵皆为题请注销本章或纠参官员赴任违限、计册违例等事，对于朝纲政事则鲜所建白。则谏议并非满洲副理事官之专司，其所处理多为具体的行政技术性事务，亦即是六科对于官僚体制内部制度化运作之监察。在满洲政治经验尚未成熟之时，这样

① 内阁大库档案 167244 号，折库讷等题本。

② 《明清档案》A37—43，莽色题本。

③ 内阁大库档案 167265 号，花上奏本。

④ 《清世祖实录》卷 76，顺治十年六月壬子；同书卷 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⑤ 《清世祖实录》卷 104，顺治十三年十月己卯。

⑥ 《清世祖实录》卷 115，顺治十五年三月乙卯；内阁大库档案 167265 号，花上奏本。

⑦ 康熙《大清会典》卷 6，第 711 册，第 185、190 页。

⑧ 《明清档案》A12—172，花上等题本；A16—134，打哈他等题本；内阁大库档案 087908 号，福哈等题本。

品秩的设置与职权的划分无疑在确保六科发挥其职能的同时，实现了满洲政治对其的全面监临掌控。<sup>①</sup>

清人对于副理事官之制已不甚明晰，往往将之与给事中混淆，兹举二例证之。其一，顾汧为祁通格作神道碑云“（顺治）九年应进士科……未几升工科都给事中”<sup>②</sup>。内阁大库档案中存有祁通格之题本、揭帖甚多，结衔皆译写爱惜喇库哈方，《清世祖实录》中厘定为副理事官，但其人实未尝任都给事中。其二，《皇清奏议》收录散都（即三都）、姚文然《合请优礼大臣疏》，散都之结衔作“工科给事中兼员外郎臣散都”<sup>③</sup>，而《清世祖实录》则作“副理事官”<sup>④</sup>，档案作爱惜喇库哈方<sup>⑤</sup>。“给事中兼员外郎”之名并不合于制度，盖传抄者以后世制度衡之，一误将 aisilakū hafan 译作员外郎，而六科既无此官，再误遂更冠以给事中之名。此二例皆以不知国初制度致误。顾汧为康熙时人，去顺治朝未远，其将祁通格官衔误作都给事中，盖以时人视之，满缺副理事官在六科体系中之地位正与汉都给事中相同，足为上文论述之例证。

### （三）他赤哈哈番等

在六科满缺职官体系中，副理事官之下为他赤哈哈番（他赤哈哈方，taciha hafan）与笔帖式哈番（bithesi i hafan）。两职自太宗时即设于各部院，他赤哈哈番秩六品、笔帖式哈番秩七品。<sup>⑥</sup>尚宝司、中书科等处亦设有。其来源有三，一为荫生，满洲蒙古一二品荫生可授他赤哈哈番、三四品荫生可授笔帖式哈番；一为科试，八旗生员乡试中第后即可补授；一为由笔帖式年久者选授。<sup>⑦</sup>六科他赤哈哈番未知设于何时，档案中所见最早一例在顺治五年三月。<sup>⑧</sup>笔帖式哈番未见于内阁大库档案，《清世祖实录》十年三月丙戌条云：“增设吏、户、兵、刑科满洲笔帖式哈番各一员”，所言甚为含混，不知其官始设于此，抑或原有而又加员额。十二年九月，复增设刑科笔帖式哈番二员。<sup>⑨</sup>十五年七月，以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俱属冗官，谕裁去，设无品笔帖式。

次论其职掌与地位。因文献无征，笔帖式哈番之具体状况不得而知，此处仅讨论他赤哈哈番。依据各衙门之通例，他赤哈哈番“专司书写册籍”<sup>⑩</sup>，亦即是办理发抄记册、满汉文移等事。六科他赤哈哈番之职掌大抵可分为三类。一为六科日常事务，如揭报赴任违限官员、奏明六科职掌、揭请钦点科臣等<sup>⑪</sup>；一为监察官员，如十二年工科他赤哈哈番土克善劾兵科副理事官孙兰潜通邦芝龙<sup>⑫</sup>；一为建言政事，如十二年刑科他赤哈哈番艾穆布疏请严缉私贩马匹者，该管官有故为宽纵者从重议罪。<sup>⑬</sup>他赤哈哈番在六科体系中之地位大抵在汉官都给事中之下、左右给事中之

① 六科满洲副理事官题本及揭帖凡 22 件：006220、006604、007634、036738、167244、006234、006166、037637、007217、036511、086950、036113、088596、163986、087908、037800、037754、036748、007134、036742、189505、167257 号。建言朝政者，仅 006604 号请扩八旗葬地、007634 号论畿辅捕盗，为工科爱惜喇库哈方祁通格上。《清世祖实录》卷 69、70、71、83 记有六科满洲副理事官建言朝政事 5 例。

② 顾汧：《凤池园文集》卷 8，《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7 辑 26 册，第 439 页。

③ 仁和琴川居士辑：《皇清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卷 5，第 1 册，第 591 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 71，顺治十年正月癸酉。

⑤ 《明清档案》A17—29，散都题本。《皇清奏议》录疏原件不存，此件为散都十年四月内题本。

⑥ 《清世祖实录》卷 18，顺治二年闰六月壬辰。

⑦ 三类分见《清世祖实录》卷 105，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壬辰；卷 106，顺治十四年正月甲子；卷 18，顺治二年闰六月壬辰。

⑧ 《明清档案》A7—178，参达士揭帖。

⑨ 《清世祖实录》卷 93，顺治十二年九月癸未。

⑩ 《清世祖实录》卷 119，顺治十五年七月己未。

⑪ 分别见《明清档案》A8—40；内阁大库档案 007216 号，花上题本；《明清档案》A7—178，参达士揭帖。

⑫ 《清世祖实录》卷 90，顺治十二年三月丁未。

⑬ 《清世祖实录》卷 93，顺治十二年九月。

上（或与左右给事中相同）。如顺治七年，吏科揭报赴任违限官员揭帖之署名即作“吏科他赤哈哈方臣花上、署科事左给事中臣孙襄”<sup>①</sup>；又前引十年十月户科题本，其列名为：“户科爱惜喇库哈方臣打哈他、臣夸哈里、都给事中臣杨璜、他赤哈哈方臣乌木恺、右给事中臣陈协”<sup>②</sup>，均可证。

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裁撤后，每科别设主事一员。此职仅于《清世祖实录》一见，其详不可考。

## 二、科臣选任与升转

溯推顺治十八年前之六科“旧制”，除上文据档案以及实录所作的复原外，更宜于科臣群体中求之，故列此一节，以此考察六科人事运作方式。限于文献，仅探讨给事中（含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及散给事中，下同）群体，诸满洲、汉军官缺皆不计，此界定亦符合清代史籍中对“科臣”的定义。兹分出身与升转两项言之。

### （一）选任

雍正《大清会典》云：

旧制，都给事中由左给事中转，左给事中由右给事中转，后官制改定，止转掌印。旧例，论俸升补。康熙六年议准，选择贤能开列具题。七年题准，由选择给事中者较俸题补掌印。八年议准，停止选择，仍论俸升转。<sup>③</sup>

此段出自《满缺升补》卷，因顺治朝给事中并无满缺，“旧例”云者，当指汉缺为言。据此，康熙以后给事中选任不出论俸与任贤二途，任贤含有一部分“特用”成分，可超越建立在官阶基础上的铨选秩序，但在政治实践中“任贤”一途难以实现，未几即告停顿；“论俸”，亦即是设计严密之铨选秩序，是清代给事中选任的重要途径。然而顺治朝给事中选任的具体规则，《大清会典》等政书中语焉不详，下文将以制度运作中的人事实例为中心进行分析。

出身是影响选任的限制因素之一，在《清世祖实录》所载的128名科臣（也是顺治朝科臣的总人数）中，出身未详者7人，此外进士108人、举人11人、贡生2人，由此可见，科试的正途出身确是清初科臣选任之重要标准。至于科臣的选任途径，可归纳为三，其一为科试授职，其二为铨选，另有一种为举荐，适用范围较小，略相当于明初之“特用”。总体言之，基本袭用明代已有定法的任用规则。

科试授职，准确来说是新科进士授职，是顺治朝给事中颇为重要的来源之一。128名科臣中，选任途径不详者1人，另有8人属于故明给事中留任，其选任在断代上应归入明代，不复讨论。剩余119人中，有43人出自科试授职，且全部属新科进士授职。明初尚有以举人径授为给事中者，至清代则举人可任之京朝官仅限于内阁中书等，范围较明为小，此举亦是员额有限的官僚体制在日益增长的高级功名持有群体之压力下的必然之举。新科进士授职多为庶吉士散馆授职。凡选为庶吉士者则谓之馆选，入翰林院读书三年，期满考核授职，谓之“散馆”。清代自顺治三年开科后，历科皆用馆选不替，形成较为严密之制度。是年三月，即有吏科都给事中向玉轩援引故明旧制，题请多除新科进士为科道官，“以诸士新硎初发，朝气方锐，当必有嘉谋嘉猷”<sup>④</sup>。六年四月，丙戌科馆选庶常散馆，胡之骏、常若柱授给事中，此为庶常任科职之始。作

① 《明清档案》A11—165，花上等揭帖。

② 《明清档案》A16—134，打哈他等题本。按，内阁大库档案294413号，丝纶簿残件：“吏科他赤哈哈花上、都给事杜立德”，他赤哈哈番列名在都给事中前，此为仅见。

③ 雍正《大清会典》卷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62册，第313页。

④ 《明清档案》A4—63，向玉轩揭帖。

为清代制度的“满洲特性”之一，馆选首科起已分习清、汉书。首科散馆后，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上言：

前此两科馆选，皆有清书……但以选员无多，仅充编纂，故未有改授别衙门者。臣请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其读清书者……亦与汉书庶吉士一体改授科道等官，或备不时召对，据情直启，可省转译之烦；或出巡方，亦便与满洲驻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以收同心合力之效。<sup>①</sup>

根据顺治朝给事中选任的总体状况，此议显然得到采纳。这一点亦是对明代制度的承袭与变通。据学者研究，明代庶常散馆授科道官极为常见，自成化五年（1469）至崇祯季年凡 35 科馆选，22 科全授科道官。<sup>②</sup> 清初则缩小了散馆授职科道的比率，使庶常流向偏重编、检等馆职，此趋势萌芽于顺治朝，至康熙中叶最终确定。<sup>③</sup> 姚文然疏请广选庶常以授科道，实际是以明制为标准，明制之本意乃在尊崇庶常，而姚氏将“清书精熟”作为前提，则是将中原制度缘饰以满洲特性，相近的制度建构背后却有行政者的不同考量，此亦是传统明清制度变迁中的一种断裂因素。

给事中最为重要的来源是铨选，亦即是已入仕者根据吏部铨法选任此官，对内而言是考选，对外官则谓之行取。铨法之资格，最为简要的概括即是“论俸”，即根据品阶与资历划定铨选序列，《大清会典》中对其具体内容语焉不详。根据《清世祖实录》对于顺治朝 72 名由考选授职之给事中的记载，将其任前官统计如下。

表 2 顺治朝给事中任前官职

内外官	人数	比率	职官	人数	比率
京官	34	47. 22%	中书舍人	10	13. 89%
			郎中	6	8. 33%
			主事	5	6. 94%
			博士	3	4. 17%
			行人	6	8. 33%
			评事	3	4. 17%
			员外郎	1	1. 39%
外官	38	52. 78%	知县	28	38. 89%
			推官	10	13. 89%

京官与外官选任之比率基本相同，可见在铨法上并无偏倚。考选含中书舍人、郎中、行人、主事、评事、博士、员外郎七种来源，基本可分为部员与中行评博两类。中行评博在清初政治中素被视为同一铨选的基本单位，故其连称在文献中极为常见。其在清初铨法中处于相对底端的位置，大体与六科给事中平行，同为官员入仕之初阶。部臣（特别是郎中）入科，则多出自特旨，因其品秩与给事中多无法构成升转关系。所谓行取，即外官（尤其是知县、推官）三年考满，视其考绩高下为升降。其升迁等第，《明史》云：“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sup>④</sup> 清初大体袭用明制，由吏部“详观其年貌，细察其品行，严考其学问”，“三者咸备，方

① 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卷 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7 辑 18 册，第 206 页。又见《清世祖实录》卷 44，文字稍有修饰。

② 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颜广文：《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③ 散馆授给事中之最后一例为康熙二十一年壬辰科，授御史之最后一例为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参看宋秉仁：《清代前期翰林院体制与儒生官僚格局》，第 214、215 页，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④ 《明史》卷 71《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 册，第 1718 页。

得入选”<sup>①</sup>，考核甚严。“所称最亲民者，无如令最”<sup>②</sup>，以推、知等知悉輿情之官内补科道，实是继承明思宗的政治遗产<sup>③</sup>，以具有实际政务经验的官僚弥补馆选进士“非职业化”之缺陷。

选任渠道之三为举荐，略相当于明初之“特用”。不过明初“特用”多针对监生等低级功名持有者甚或布衣，清初举荐则是胜朝旧臣，皆具有进士功名。鼎革后隐居山野，以地方官之举荐而特授职官。此类人数较少，仅有4人，即陆貽吉、于沚（皆顺治十三年）、陈台孙（顺治十四年）、胡尔恺（顺治十五年）。就地域言之，陆貽吉、于沚、陈台孙皆为江苏人，为江南巡抚所举，胡尔恺为长沙人，系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所荐。特别是胡尔恺之举荐，与清军平定西南诸省事属先后。因此，特用一途无疑具有极深的政治象征意义。

## （二）升转

升转可归纳为科内升转与出科升转。先言科内升转。前引雍正《大清会典》云：“都给事中由左给事中转，左给事中由右给事中转。”此是顺治朝给事中科内升转之大纲，基本得以遵守，但亦有特例：如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刑科右给事中朱徽迁吏科都给事中、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兵科右给事中李士焜迁刑科都给事中，可视为国初制度“变例”，在顺治朝中后期不复见。六科对给事中科内升转具有相当的自主权，遇有缺出，即由六科官员具题应补者以俟钦定，如兵科他赤哈参达士揭帖：

照得职科都给事中郝□□□□二十六日该吏部题奉钦依升补通政使司右参议，所有印信缺人掌理。查见任科员他赤哈职参达士、职马呼、左给事中职郝璧俱各□任，伏乞圣明简命壹员掌管。<sup>④</sup>

具揭人为满官，但并不意味着六科人事权归于满官。现仍可见汉官的相关题请，如顺治元年十一月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题请简员署理工科印务<sup>⑤</sup>。更可留意者，吏科作为六科之长，遇他科有缺，有“题请代署”之权。若据参达士揭帖，给事中缺员后，本科地位较低的满官即有题补之权；而据龚鼎孳题本，是时工科尚有给事中向玉轩在，何以需吏科代题。但吏科对六科人事权究竟有何种程度的掌控，根据现有文献与档案尚无法得到确切解答。考虑到吏科掌有题请科臣出科升转之权（详后），则其对于科内升转，无论于法理或事实上，宜获得大于其他五科之话语权。清初的制度设计使六科内形成了“散—左—右—都”的相对封闭的铨选序列，若不考虑任内病故、降革等特殊因素，一般情况下，科臣皆由散给事中依据此序列递迁至都给事中后，方迁出六科体系。此种相对封闭的铨选序列使科臣群体得以保持相对稳定，此无疑有助于六科职能之发挥。但科内升转的具体细节，《大清会典》并未说明，所幸内阁大库档案中尚能找到一份揭帖残件，为吏科右给事中阴润申诉左给事中孙襄升转紊乱事，本末已不甚清楚，不过文内提及给事中升转的若干程序则甚有价值，节录如下：

从来六科升转，有无咨而升者乎？有之，自襄始也。有咨而升为常，无咨而升为变。从来吏部推升见在科臣，有无咨而推者乎？有之，自推襄始也。有咨而推为常……即以职不宜转左，宜驳回科咨，另取人可也。即不然，转职为别科右亦可也。待职转右之后再取咨，升孙襄为吏科左，亦无不可也。……又以孙襄见在署科，无自行署名升转之理，斯言误矣。若然，则襄之由散升右也，彼时襄不署科乎？署名出咨者谁乎？<sup>⑥</sup>

揭帖中所分别的“六科升转”与“吏部推升”，即是本文所言“科内升转”与“出科升转”，其

① 《明清档案》A8—113，刘樾题本。

② 乾隆《滑县志》卷10《名宦·滑县知县钟公去思碑》，第9页下，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③ 《明史》卷251《郑以伟传》，第21册，第6495页。

④ 《明清档案》A7—178，参达士揭帖。

⑤ 《明清档案》A2—49，龚鼎孳题本。

⑥ 《明清档案》A3—151，阴润揭帖。

差异在于科内为“升”而出科为“推”，亦即说给事中出科升转必当经过会推，而科内之官职变动则仅需本科议定。其中涉及到最为重要的概念为“科咨”，即六科出具之咨文。无论“升”或“推”皆须以此为法理上的依据。吏部之作用为审查六科所拟定人选是否合于升转则例，合则具题，如有不合则驳回另拟，六科在人事选择上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从文末特言孙襄“署科”与“署名出咨”来看，此“科咨”当由本科都给事中署名，如都给事中空缺，则由署理者署名。

次言出科升转。如上文言，清初六科基本是一个封闭的铨选序列。出科升转同是将给事中相对独立的铨选序列与清代官僚铨选体系相贯通的重要途径，故而政书中有关记载较科内升转为详。科道官由于其性质之特殊，在铨选时不受“俸满”约束，康熙《大清会典》云：

凡京官升转，除京堂、翰林、吏部、科道官外，其各部郎中历俸一年、内阁中书历俸三年，其余京职历俸两年方升。<sup>①</sup>

因此，科道官之升转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据雍正《大清会典》，汉缺给事中可升之官计有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奉天府府丞、督捕理事官等。<sup>②</sup>其文虽晚出，但如督捕衙门已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并入刑部衙门<sup>③</sup>，知此所记实是康熙早期制度。但顺治朝的详细状况仍应于人事中考察。顺治朝给事中除任内降调、病故、致仕、革职等情外，《清世祖实录》中迁转别职而确然可考者计 66 人，其流向如表 3 所示。

表 3 顺治朝都给事中出科流向

流向	人数	比率	流向	人数	比率
道员	29	43.93%	太常寺少卿	10	15.14%
太仆寺少卿	7	10.60%	顺天府府丞	4	6.05%
提督四译馆	3	4.54%	京卿 <sup>④</sup>	2	3.03%
右通政	2	3.03%	知府	1	1.52%
大理寺少卿	1	1.52%	鸿胪寺卿	1	1.52%
督捕理事官	1	1.52%	御史	1	1.52%
外转 <sup>⑤</sup>	1	1.52%	右参议	1	1.52%
主事	1	1.52%	左副都御史	1	1.52%

按铨政通例，可归纳为内升、外转两类。前者 35 人，占 53.03%，后者 31 人，占 46.97%，内升、外转基本呈均势，《大清会典》中则完全遗漏外转一途。内升中升京卿者最多，凡 24 人，占 36.4%。御史、左副都御史两类较显特殊，御史与都给事中同为正七品，本属平级调用；左副都御史则为正三品，与部院侍郎同，以正七品而骤迁正三品，未免超擢太甚。而此两例各仅有 1 人，当视为六科升转之特例。外转为科臣的另一出路，顺治十二年（1655）曾定“科道官内升外转差遣，俱亲加裁定，著为例”<sup>⑥</sup>，可见其重要性不亚于内升。自顺治帝看来，“国家官人，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敷历，方见真才”<sup>⑦</sup>。建立此种内外互通之升转模式，实是顺治帝重要的治理策略，亦是顺治朝政治的一个突出特色。

在出科升转上，六科亦与吏部共享人事权，确切而言，是吏科与吏部共享人事权。康熙《大清会典》述吏科职掌：“凡六科汉官内升外转，旧例，每年二、八月，各科将条陈参劾本章

① 康熙《大清会典》卷 8，第 711 册，第 310 页。  
② 雍正《大清会典》卷 12，第 762 册，第 519 页。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 81，上册，考 5599，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  
④⑤ 未详其具体职务。  
⑥ 康熙《大清会典》卷 8，第 711 册，第 319 页。  
⑦ 《清世祖实录》卷 74，顺治十年四月庚子。



造册移送本科，序俸开列题请钦定，内升一员、外转一员。”<sup>①</sup> 此中具体操作，与科内升转甚为相近，前引阴润揭帖残件中，对于此过程亦提供了一个实例：

孙襄之咨升京堂也，初咨冯杰在前、李士焜次之、龚鼎孳又次之，吏部驳回另取，孙襄复咨鼎孳为首、士焜次之、冯杰又次之，咨稿具在，彼何以驳，此何以不驳？总之，咨升京堂不是意中之人，故驳咨而升之。<sup>②</sup>

循例内升外转时的候补人选虽由本科报送吏科，由吏科送吏部具题，吏科似仅承担传递之责。但由此例观之，吏科都给事中在咨部次序之确定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揭帖中提及者，冯杰为户科都给事中、李士焜为刑科都给事中、龚鼎孳为礼科都给事中，内升之名额最终归于龚鼎孳，彼于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次序之先后，实际隐含有升迁可能性之大小，最终升迁者往往是“首拟”（或“正拟”）之人，而非“陪拟”者。此种次序，理应由吏科都给事中据应拟者历俸之深浅划定，但在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无论是都给事中抑或吏部，皆可按照意愿对此次序进行干扰，以影响最终的人事变迁。

### 三、余论

前文通过职官制度构建与运作两方面对顺治朝六科进行了初步探讨。至于六科职掌及其在文书处理中之作用，则明文载在政书，且于有清一代鲜所更替，故置而不论。在此仅以封驳与科参为例，附论顺治朝六科权力变迁。

明人最重科道封驳，所谓“一时之得失系焉，万世之公议存焉”<sup>③</sup>，入清后则其权渐衰，孟森先生曾就清代“有科钞而无封驳”论两代士气之转移<sup>④</sup>。准确而言，清代并未废除六科封驳与科参之权，自康熙至光绪《大清会典》咸有记述，即所谓“封还执奏”与“驳正题参”<sup>⑤</sup>；不仅如此，世宗尚曾传谕内阁，谕令倘有不妥，阁臣宜加封还，内阁与六科在文书处理上本属连带机构，清帝于科臣封驳之态度理宜近是。<sup>⑥</sup> 但检诸史籍，顺治朝确未见有科臣封驳的实例，以致顺治十七年吏部对内阁、谏垣重申此权<sup>⑦</sup>；科参则尚可见两件原文，为给事中王命岳就吏部尚书王永吉铨政疏之驳正。<sup>⑧</sup>

封驳与科参在清初渐趋衰落之原因有二，其一为中央政权权力结构之变迁，特别是满洲政治体系确立后，由贵族政治模式演变而来的议政处处于决策核心位置，内阁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大为下降，作为连带机构的六科，亦随之而然。明代科臣持封驳权至慎，所争皆关系政本者，正遵成祖“为治贵得大体”<sup>⑨</sup>之训。清初不仅权力结构有所改变，且本章处理之流程亦与明代稍异，其最终结果即是军国大政六科无从封驳，而日常政务多为君上与阁臣讨论裁夺，亦无需六科封驳。其二为清初对于言路之政策。在奏折未普及前，科道言事为“朝廷耳目”<sup>⑩</sup>，是朝廷重要的信息渠道。但若以行政资源促使科道进言而漫无约束，必蹈明季党祸之覆辙。故顺治朝开禁“风闻奏事”是以“言之必实”为前提，言事虚妄者必加反坐。此外，对于科臣言事的范围亦多

① 康熙《大清会典》卷160，第730册，第7709页、第7710页。

② 《明清档案》A3—151，阴润揭帖。

③ 刘命清：《虎溪渔叟集》卷16，《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册，第617页。

④ 孟森：《崇祯存实疏钞跋》，收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上册，第15页、第16页。

⑤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160，第730册，第7707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

⑦ 《清世祖实录》卷137，顺治十七年六月己酉。

⑧ 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4册，第604—607页。

⑨ 朱国桢：《皇明大训记》卷11，永乐二年三月己巳，《续修四库全书》第429册，第579页。

⑩ 《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甲寅。

有限制，事涉满洲根本政策（如圈地等）者，一概严惩不贷，李裨案即是明证。科臣缄默之风由是而滋生，皇权对于言路的控制由是而加强，随之而来的陈名夏案、陈之遴案、刘正宗案，言官皆在皇权之授意下成为表面上的始作俑者。至此，言路甚至成为皇权间接传达政治信号的途径；远而言之，郭琇之劾明珠，王念孙、广兴之劾和珅，其制度与政策上的内在理路，无疑皆可追溯至顺治朝。在此环境中，六科封驳与科参之权固无从落实。

在明清制度变迁中，六科“继承”与“断裂”因素并存。前者自不待言，清初六科整体架构与运作方式多参照明季的政治遗产。至于“断裂”层面，首先体现在顺治朝六科特殊的满汉复职制，这原是中原王朝之谏议制度无法直接纳入满洲政治传统时实行的权宜之策，在顺治十八年改制后最终回归一般意义上的满汉复职制，亦代表满洲政治之日趋成熟。在制度运作上，如除进士入科，则在传统中原制度外又缘饰以满洲政制的特色；推、知行取与科臣外放，则代表了顺治帝建立沟通内一外的升转体系的尝试。六科封驳与科参权在实际政治运行层面的衰落，固然是权力中心转移带来的结构性调整，但亦预示着清初皇权对六科全面控制的实现。顺治中，王夫之探讨宋以降谏议制度层层制约之弊，以为解决之策莫过于“君德独任”<sup>①</sup>。事实上，清初六科的变迁趋势正可用此四字概括。

### 主要参考文献

[ 1 ] 内阁大库档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  
[ 2 ] 康熙朝《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年。  
[ 3 ] 雍正朝《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  
[ 4 ] 刘命清：《虎溪渔叟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5 ] 罗振玉辑：《天聪朝臣工奏议》，《史料丛刊初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年。  
[ 6 ]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 7 ] 仁和琴川居士辑：《皇清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 8 ] 宋秉仁：《清代前期翰林院体制与儒生官僚格局》，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1 年。  
[ 9 ] 王夫之：《黄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 10 ] 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  
[ 11 ] 颜广文：《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  
[ 12 ] 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 13 ] 张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 14 ] 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  
[ 15 ] 朱国桢：《皇明大训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 A Brief Account of the Six Offices of Scrutiny in the Shunzhi Reign

MA Zimu (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azimu92@163.com)

The Six Offices of Scrutiny was a system of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at greatly contribute to cleaning up government. The *Collected Statutes* had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system in the Shunzhi reign. This essay examines official and private records to attempt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x Offices of Scrutiny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method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bing into the changes in the Six Offices of Scrutiny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① 王夫之：《黄书》，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24 页、第 125 页。